

梁
鸿

著

“灵光”的消逝

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文学评论三部曲

“灵光”的消逝：

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

梁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 / 梁鸿

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086-5687-8

I. ①灵… II. ①梁… III. ①文学批评 IV. ①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276877 号

“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

著 者：梁 鸿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687-8 / I · 729

定 价：58.00 元

印 张：11.75 字 数：230 千字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梁鸿：行走与现实与学理之间

阎连科

在作家的队伍中，有许多队员来自乡村，但在批评家的队伍中，更多的队员来自城市。究其缘由，大约是作家更易于野生野长，所谓的自学而成才，如许多人说的那样，好像作家果真不须读太多书似的。而乡村那块土地，也正好是最易野生野长的去处，是块很难找到图书馆的地方。这样，从今天日益壮大起来的批评家队伍里看，来自乡村的批评家比例偏低，也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

好在，来自都市的批评家，也还钟爱乡村文学。

好在，批评家的队伍里，总还有来自乡村的学者和热爱现当代文学的批评家。现供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青年学者梁鸿，就是这样一个完全生于乡土、长于乡土，而学于学院、成于学院的批评家。因为都是河南人，河南人又多重乡情，我与她也就自然地有了过往，渐次地熟悉。终于到了人家一声一声地叫我“阎老师”，听起来像叫大哥一样自然随意。但真正对梁鸿由熟悉到了解，再到对这样的晚辈有了尊敬，是忽然有一天，不仅听说她是完全生长于乡村，而且同我家乡的弟弟、妹妹一样，从小都割草喂猪、下地干活儿，而且直到初中毕业，到县城读师范学校之前，还没有离开过家乡那

隅乡镇。

于是，师范毕业，她就又回到乡村做了小学教师。在教了三年书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知道老师居然还可以考教育学院脱产继续读书，欣喜若狂，经过了一番苦读，就又到教育学院上学去了。终归，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可到了学校，眼界就更为宽广，一下子明了，读书原是如登山和攀爬阶梯一样，有着一级一级的更高。于是，也就开始了自学本科，从ABC起始自学英语，然后考到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读研究生，接下来，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博士。在茫茫人海之中，一个来自偏远乡村的女孩，就这样一脚踏着乡野的小道，一手抚弄着路边的荆草庄稼，如同一个拾麦穗的孩子，把她的学业一穗一把地拾进篮里，装进自己的心中。末了，也就从王富仁的麾下毕业，留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读书、读书写作、写作批评，年纪轻轻就做了副教授，年纪轻轻就做了一个对当代文学可以指点说议的批评家。

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如同一个人永远无法了解另一个人走过的人生途中有多少荆棘一样，我们，谁都无法了解体悟一个乡野的女孩，把牧羊的鞭子挂在田头树下，或把在田野累了一天的铁锹锄头倚靠在回家的门后，迅速捧起书本的那种感觉。无法体验因为劳动，使十指麻木胀大，握不住笔杆又必须像握住锄头样握住笔杆的那种感觉。我想，放下握锄头的双手，无间歇地迅速去握住笔杆，那大约如同拥抱了一天大地，在夕阳西照之时，又要迅速去拥抱一缕落日。

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吧。

总之，忽然对梁鸿有些敬重。对她走过的人生，有着几分敬畏。也就特别去看她写过的文章，尤其是她写过的批评文章，也就

读到她的博士毕业论文《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洋洋洒洒，二十六七万字，完全是一部长篇的篇幅。20世纪，河南是人口大省，因为基数甚大，作家自然甚多，复杂的文学现象，各类文学作品，也如汗牛充栋。中原自古就为国之中心，文学的分量和杂乱，也如一个国家的有序和无序，可在《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中，却被一个年轻姑娘分析得条条理理、筋腱如丝、丝如筋腱。依据着河南的土地、文化和历史及其在20世纪中国政治空间中的位置及变迁，依据河南人的文化共性和做人的私性，先有宏观的史论，然后一个作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分析，一切都如她的一盘理论之棋上的车马相卒，有规有矩、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有时一卒，在整个文学中，有着车马之用；有时一车，在文学中，也才一卒之功。分析作品，大可笼统而去，小可精雕细刻，有时让人印记如刻，有时让人内心欣慰。终于，也就对这个博士，这个年纪轻轻的学者，感到尊敬，感到敬畏，感到原来土地可以出产作家，也可以出产论家，并且是有些别样的理论家。

说到欣慰，是因为梁鸿在她的文章中常常提到我的名字和作品，而且，为我的作品写过不少表扬的文字。在这一点上，与其说我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我是一个庸常的俗辈，因为批评家说我好时，我总是心里高兴。有些文章，说我的文学成就多高多高，哪怕过头、名不副实，我也还是满心欢喜；而说我不好，哪怕名副其实，我心里接受，但也会觉得没有比说我好感到愉快。

说到尊敬，是因为说我好的批评文章，也常要说到我的不足。这种不足，不是在通常中见到的那一种“瑕不掩瑜”的说法，而是文本分析，有条有理，让你无言以对，不得不服。而至于梁鸿，对她的那份尊敬，是因为我们彼此熟悉，来往较多，我又年长她许多，

而她也敢于直接地批评我说，“你的《受活》技术性过强，隐藏着小说的‘技术主义’”，“你的《为人民服务》被禁了也好，因为它的故事重复了《坚硬如水》”，“你的《丁庄梦》写得委婉，但却缩手缩脚，最应该是一部有巨大张力的小说，被你写得玲珑剔透，过分完整”。她不光说这些，还要写上这些，还要在《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小说的地理世界谈起》一文中，那么直接、确切地说我的“耙耧山脉”的封闭和局限，以及我对整个世界在认识和描写上造成的阻隔和遗憾。

因此，对她感到欣慰，也感到尊敬。

说到“别样”，我是觉得，她的理论文章，有自己的人生融在其中。小说、故事中没有作家的人生，就不会有作家的心灵。没有心灵，就不用再谈小说的好与坏了。但是，对于批评家学者的文章，应不应该在文章中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实在是件难以叫人说定的事情。一说到理论，论文和论著，我总觉得那是学问，学问似乎是不应该有作者的人生与心灵的，似乎只有那样才客观，也才更见包容。可是我，小说读得多了，养偏了胃口，总是爱读那些能在自己的论文、论著里融入自己的人生和心灵的理论文章，爱读那些简洁、晓白，行文上有些“散文味”的论文。

梁鸿的批评中没有散文的味道。

可她，能在那些文章中揉进自己人生的体验，揉进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由此，挥散开来，表达自己对文学、对作品的分析、理解和评判。曾听她提及过，当年她在博士论文答辩时还因为论文中融入强烈的主观情感和对现实文化现象的关注而被答辩老师反复讨论。再比如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那篇《当代文学往何处去——对“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再认识》，就实在是有些好看，实在是有着它的

道理，有着她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生经验与体悟的揉入。还有《当代作家评论》“批评家专辑”中论说李洱小说的文章《“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李洱的这部小说，从乡土文学出发非常值得讨论，绝不能用好与不好来简单评判。梁鸿从中发现的是它与乡村“灵光”叙事在美学意义上的不同，给了这部小说全新的定位和理解，使《石榴树上结樱桃》从文学史的角度有了新生的意义。这样一篇文章，不光指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中隐藏的作家李洱的写作光点，也闪现着梁鸿自己对乡村世界，尤其是当下的乡村现实的认识和看法。读了之后，实在是可以给我今后的写作一些意外的启发。还有她的那些关于河南作家整体批判性文章和作家论，如“刘震云论”“周大新论”等，都让人感到她自己人生与心灵在那论中的光耀。

近年来，梁鸿的研究视野越来越宽广，从她思考的方向，以“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为切入点考察当代文学理论转向的问题，从作家批判主义简单化倾向思考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美学匮乏问题，从文学“灵光”的消逝与妥协的“方言”现象思考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与“底层存在”问题，从对“狂欢”话语的考证切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场与文化场域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都可以发现梁鸿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的逐渐成熟与思维深广度的增加。更为可贵的是，它们显示了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她不仅仅是把这些作为学问来做，还将之作为理解社会、人生与自我生命存在的途径，她把自己的生命热情与体验也融入了进去。这也是她这本著作《“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最让人难忘的地方。

目 录

梁鸿：行走在现实与学理之间 / VII

第一辑 重回历史维度

“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 / 003

当代文学批判主义历史观的简单化倾向 / 021

对“常识”的必要反对：当代文学“历史意识”的匮乏与
美学误区 / 034

第二辑 家族主题的嬗变与现代性追寻

家族苦难史与新的革命话语、民族叙事的建构 / 055

回家·审父·文化寻根 / 065

解构·恋祖·寓言：“家”的象征叙事 / 072

性与族权：《白鹿原》中的性文化意蕴 / 084

第三辑 女性身份的叙事

女性书写中“男性”角色的转换与象征：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困境 / 099

从性的成长史看女性的命运：李昂小说中的性意识 / 110

女性存在的赞美诗：重读“三恋”兼谈王安忆的写作理念 / 120

王安忆的“布尔乔亚”：论《长恨歌》女性叙事的空间隐喻 / 131

悲天悯人的“撒旦” / 140

陈染、林白作品中的性世界 / 146

第四辑 当代乡土叙事的美学裂变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乡土小说的美学裂变 / 155

文学视野中的“村庄”困境：从阎连科、莫言、李锐的小说世界谈起 / 170

妥协的方言与沉默的世界：论阎连科小说语言兼谈一种写作精神 / 185

通往“底层”之路：对“底层写作”概念及批评倾向的反思 / 201

第五辑 “个体时代”的来临

“狂欢”话语考：大众文化的兴起与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的发生 / 221

理性乌托邦与中产阶级化审美：20 世纪 60 年代
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 / 244

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考察 / 271

暧昧的“民间”：“断裂问卷”与 20 世纪 90 年
代文学的转向 / 293

王朔：从“黑马”到“白马”的嬗变 / 317

毕飞宇：“温暖”美学及其可能性 / 329

后记 / 345

理性与“灵光” / 347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 / 359

第一辑

重回历史维度

“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转向

稍有理论敏感的人都会发现，在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文学批评界讨论得最多的不再是文学与形式的关系，而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反思“纯文学”、辨析“文学性”，还是重提文学的“人民性”^①，它们背后都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论关注点，即对 20 世纪 90 年代后当代文学现实性的不足及文学精神的逐渐衰落进行深度思考。在这中，现实主义理论被再次关注，相当多的核心期刊或学术会议专门探讨“现实主义传统失落”“现实如何重新主义”等

① 陈晓明：《“人民性”与美学的脱身术——对当前小说艺术倾向的分析》，《文学评论》2005 年第 2 期；王晓华：《我们应该怎样建构文学的人民性》，《文艺争鸣》2005 年第 2 期等。在很多学术网上都有相关问题的文章，如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文艺学新周刊》第 12 期汇集了学术期刊发表的关于“文学性”讨论的诸多文章。

问题^①，这些论文或会议针对当代文学创作中所暴露的具体问题，分析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和当代价值，并希望以此作为使文学重返现实的途径。可以说，“重返现实主义”正在形成强大的理论呼唤，对当下的文学批评格局和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但是，问题也随之出现，在某些批评者的文章中，“现实主义”被简约为题材的现实，“真实”也仍然被局限为对社会生活图景的再现或发掘；在另外一些论者那里，现实主义则几乎成为一个道德问题；而相当多的论者只是把它作为文学的一种精神向度来呼吁，没能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同时，也有学者或作家对这一思潮并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复古”或对文学本质的悖反。在此意义上，本文将对“重返现实主义”的理论背景，所面临的美学困境、历史困境及所隐含的问题，做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① 比较重要的期刊文章有：《期待现实重新“主义”》（曹征路，《文艺理论批评》2005年第3期）、《与大地的苦难擦身而过——从〈受活〉看当代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失落》（邵燕君，《文艺理论批评》2004年第6期）、《贴着地面行走——〈定西孤儿院纪事〉的特色及其新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邵燕君，《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一部独特的现实主义文学史——由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所引发的思考》（杨冬，《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从〈无字〉看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发展》（贺绍俊，《南方文坛》2005年第6期）、《在倾斜的文学场为现实主义辩护》（李建军，《南方文坛》2006年第1期）。其他重要文章有：《重新理解现实主义》（李建军，《小说选刊》2006年第2期）、《现实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及其意义》（王嘉良，《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重提现实主义的超越性——从“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对几个文本的解读谈起》（苑博）、《略论当代文学现实主义的价值与向度》（顾凤威，《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2004年第4期），等等。而在众多关于当代文学发展的研讨会上，所讨论的关键无不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如2006年6月上海大学首届文学周，在“小说与当代生活”圆桌会议上，作家与批评家对小说中的“现实”概念有着明显的分歧。

一、原因与背景

有一点毋庸置疑,对“现实主义”的重新提倡并不仅仅是文学理论的简单再阐释,而是当前理论界理论转向的一个前兆,也意味着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学的问题和积弊都已经到了必须要有所突破的时候。

“重返”把当代文学和文学批评存在的本质问题以一种颇为激进的方式展示了出来,即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的“文学性”与“现实性”始终没有相对科学和理性的认识。虽然这两个概念在文学批评史上一直处于纠缠状态,但是,在中国文学的语境下,批评家对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拿来主义片面利用,忽略了它们的互文性,尤其是忽略了中国文学使用时的具体政治背景、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纯文学”理论的大力倡导只是为了摆脱政治的“紧身衣”,更多的是出于策略意义上的使用,它的提法本身就有许多漏洞。但是,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的形式本质被作为“文学性”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从“文学性”中被完全清除出去。这一清除也被看作文学终于与国家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象征,此时,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既表现为“政治”,同时也指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乐观情结”。这一理论导向的本质化倾向使当代文学产生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把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历史属性对立起来,在此意义上,把文学的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对立起来,并且形成隐性的等级秩序,这使得文学较少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时的跟进和思考;第二,把中国当代资本改革所产生的现代和后现代心理当作文学的本质内容,因此,对知识、制度、深沉、严肃等的解构主义成为文学最深刻的意义,

这直接产生了对历史、道德、社会和文化的虚无主义，以此种方式“介入”社会现实，只有颓败的伤感，很难产生理性的建构。

不可否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纯文学”口号提出到现在，当代小说发生了深刻的、富于本质意义的变化，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态成为文学基本的创作方式和叙述起点，这当中包含着对文学存在独立性和审美本体化的基本认知。另外，中国深刻的资本改革所引起的中国生活、阶层、文化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也对应了西方思想界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这使得以怀疑、虚无、非理性作为基本特征的现代主义美学得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撑，它们与“纯文学”理论的技术化和审美化倾向一起构造了新的文学原理、文学规律和文学精神。在这样的双重塑造下，所谓“纯文学”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学理论，而且成为在当代文学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新的文学标准。这就形成了“纯文学”与“政治”“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潜在思维，因此，“纯文学”理论建造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建造“文学/政治”“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二元对立思维的过程，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回避政治、回避宏大叙事成为文学自由的象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包括其他形式的现实主义，从至高无上的权威，到被质疑、批评、消解，到被完全代替。20世纪末，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冲击下，现实主义文学又被“收买”为合作者，从而成为“庸俗”“落后”“肤浅”“非文学性”等词语的代名词。

但是，一切并非如当初高举“纯文学”大旗的理论家们所想象的那样，中国文学开始进入一个殿堂时代。相反，从这些年的创作发展来看，无论是文学精神，还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本身都只是短暂的辉煌，很快便走向衰微，更重要的是，它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广泛拥有过的尊严和激情。理论的偏狭所带来的后果逐渐呈现出